



李天才：视死如归的宁夏学潮兵运领导人

李天才（1908—1933），字达之，宁夏中宁县枣园乡人。1931年初，在宁夏中学上学时，经地下党负责人杜润芝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夏，按照北平市地下党组织的指示，组织工人运动，八九月间在北平门头沟被特务逮捕，历经酷刑受伤致死，时年25岁。

1908年3月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10岁时在本村读私塾。五四运动后，新文化、新思想传入宁夏，教育界引进新式学制和课程，民主革命思潮迅速兴起。李天才在老师和高年级同学的带动下，努力学习新课程，同时剪去长辫子，留短发，穿上时兴的学生制服，与当地乡村私塾旧习惯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以自己是新时代的学生为荣。

1925年8月，冯玉祥所属西北军第二师师长刘郁芬率部经宁夏向兰州开进，在该部做政治宣传工作的宣侠父、钱清泉等中共党员路过枣园堡，向群众宣传国内外形势和西北军入甘的宗旨，提出“铲除封建军阀，打倒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的政治口号，李天才受到启发教育，积极为部队散发传单。

1926年9月，冯玉祥所部国民联军途经宁夏，入甘援陕，策应北伐，又路过枣园，部队中的中共党员深入学校，传播马列主义，开展革命活动，李天才积极参加，在实践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国民联军驻宁期间，学校改善了办学条件，普遍购置了体育器材。李天才身材魁梧，于当年秋，作为县代表队的成员参加了宁夏省首届运动会，且有一个项目获得第二名，从此，他成为学生中的一名佼佼者。

1929年春，李天才考入宁夏中学，和孙殿才相交甚厚，两人经常交流思想，探讨救国救民的道理，决心投身革命，寻找共产党组织，为革命献身。

1930年春，宁夏中学聘请北平大学毕业生杜立亭到宁夏中学任教，并代理教务主任。杜立亭是陕北米脂人，思想进步，倾向革命。5月，中共北方局利用中共党员杜润芝和杜立亭是同乡、北大校友的关系派杜润芝来宁夏，建立党的组织。在宁夏中学，李天才等一批进步学生，积极靠拢组织，踊跃投入革命活动。当时，中共党员杜润芝等人策划宁中学潮，提出“驱逐绅士徐宗鼐，

拥护杜立亭当校长”的口号，李天才等进步学生积极响应。在师生的积极斗争下，学潮取得胜利。

学潮斗争胜利之后，党组织又抓住时机，利用宁夏驻军内部的矛盾和斗争，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准备建立一支党控制下的革命武装。11月，按照党组织指示，李天才到中宁联络青年学生刘成栋、张曦等10余人与时任马鸿宾部教导大队长的马仲英旧部驻军，随马仲英起事。该举动被马鸿宾发现。马鸿宾准备下手捕杀马仲英及相关人员。马仲英得到消息后，率教导大队逃离省城，到中宁约了旧部马谦及李天才等一批青年学生约1000余人，奔往河西走廊一带。马仲英到甘肃酒泉后，受挫惨败，李天才等人便脱离马部，返回宁夏。

11月20日，经宁夏中学学潮和马仲英反叛事件后，马鸿宾加紧了对宁夏的严密统治。国民党宁夏省党部在邮局拆查来往信件，发现陕北安边小学一位教员给杜润芝的来信，有“同共产党来往”的嫌疑，便将杜润芝、杜立亭逮捕，其他进步教师被解聘，有的被驱逐出宁夏，宁夏中学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1931年初，李天才从甘肃酒泉返回宁夏，继续与狱中的杜润芝保持联系。不久，经杜润芝介绍，李天才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冯玉祥利用甘肃各派势力的矛盾，策动旧部雷中田倒马，在兰州扣押了时任甘肃省政府主席的马鸿宾。宁夏马鸿宾主力冶成章部奉命开赴兰州解危，宁夏防务一时空虚。在狱中的杜润芝得知情况后，认为应该利用这一时机，抓紧组织宁夏武装暴动。李天才按照杜润芝的指示，回中宁策动地方驻军发动兵变。先后联系了马鸿宾驻中宁保安堡第七师特务营机枪连连长孙天才和马鸿宾部副营长、原西路护

路队大队长张自箴。经过多次交谈，他们都支持反马兵暴。李天才返回宁夏省城将情况向杜润芝汇报后，杜润芝表示同意，决定在孙天才所在的特务营组织兵暴行动，并制订了计划。12月下旬发动兵暴，由于走漏风声，敌人已有准备，加之部署不周，遂遭失败，李天才被捕，被押往宁夏省城监狱。在狱中，李天才虽遭受严刑拷打，但始终没有泄露组织秘密。

1932年初，经多方营救，李天才被保释出狱。3月，枣园国民小学校校长李天禄（李天才的堂兄）聘用李天才担任该校六年级国文教员。在学校，李天才教育学生“做新时代的新主人，不当亡国奴，救国救民，敢于冲锋”。为了宣传抗日，自编歌曲，教学生咏唱：“同学们，认真听，滔天大祸已来临；来得凶，来得猛，来了日本鬼子兵；鬼子兵，占东省，烧杀抢掠任意行。救同胞，救弟兄，赶快起来打敌人；拿起枪，拿起炮，打败鬼子享太平。”

当月，杜润芝经杜斌丞等人营救出狱，到中宁枣园找李天才，约他同往兰州工作。经商议，杜润芝先行。5月，李天才到兰州，经人介绍，暂时安排在兰州百货税局工作。杜润芝到靖远水泉，和谢子长、焦维炽等人组织和发动水泉兵暴。随后，李天才也前往水泉参加水泉兵暴，任经济委员。兵暴失败后，李天才在甘、宁两省被通缉，便化装成拉船工，乘船经包头到北平。同年秋，李天才在北平找到宁夏旅平学生会，与张子华、孙殿才等人接上关系，并在西城区水月庵7号建立秘密联络点。李天才住在这里，常和张子华、孙殿才等人接头。他们白天深入工厂，熟悉工人群众，组织赤色工会，宣传抗日；晚上刷写标语，散发传单。为了防止警察抓捕，他们事先用纸包好石灰，一旦碰到警察来抓，就用石灰包向警察眼部打去，乘机逃走。

1933年初，李天才在北平后门洋车工会和东城区俄语商学院建立了两个据点，和华北总工会办事处负责人饶漱石保持联络。为了开展工作，李天才化装成洋车工人，经常同工人在生活在一起。一次外出工作，发现活动据点被特务盯梢，里面接头的同志处境十分危险，他冒险闯进院内大声说：“老张，请客在东来顺，大家都在那儿等你们。”特务们以为开会地点改了，当时没有下手，跟在李天才等人的后面，企图一网打尽。最终，李天才等人在电车工人和群众的掩护下，迅速换装，机智地甩掉了跟踪的特务。为了躲避特务跟踪，李天才在执行任务时，有时躲到寺庙神像后或躲在棺材死尸下躲藏，就这样多次化险为夷。

7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屡屡打败日军，收复察哈尔北部大片国土，军威大振，群众欢呼。李天才组织群众举行庆祝，还声援铁路工人的大罢工，以示“坚持抗日，反对投降”的决心。9月，李天才在北平门头沟从事工人运动时，不幸被捕，被押往天津监狱。

在狱中，李天才以惊人的毅力同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开始，敌人采取用封官许愿的手段，收买李天才，但遭到严词拒绝。后来，敌人又动用拔筋床、烙铁烫、赤身滚德国进口的铁钉床等极其残酷的刑具，对李天才用刑，但李天才却咬紧牙关，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不向敌人屈服，痛斥敌人道：“中国工人有爱自己国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保卫国家主权的自由，何罪之有？你们这些汉奸、卖国贼，替日本侵略者镇压工人，犯下了滔天大罪，人民是不会饶恕你们的！”惨无人道的敌人，丧心病狂，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竟然向李天才的鼻孔灌辣椒水，最终被毒害致死，时年25岁。

（据银川党史网）

戴玉玺、莫如信带头走农业合作化道路

石嘴山解放初期，土改结束后，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和生产资料，成了国家的主人。当时的平罗、惠农、陶乐三县遵照中央和上级的指示，认真贯彻“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方针，按照“由低级到高级，由小到大，由多到少，由点到面”的发展规律，领导全市人民走互助合作的集体化道路。戴玉玺、莫如信就是当时名噪一时的农业合作化带头人。

1952年上半年，宁夏省委互助合作会议后，三县主要领导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向农村广大干部和农民进行互助合作的目的、意义教育，并且大力培训互助合作骨干和积极分子，戴玉玺互助组是宁夏解放以后成立的第一个互助组。1951年，他联合村里7户没有牲畜的农民组织起全县第一个变工组，他们拉着一辆木轮大车，按户轮流向田里送粪，并拉着各种农具整地备耕。县领导发现后，对他们积极引导，很快发展成为农业生产互助组。当年夏收时，一个由12户组成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了。他带领社员积极采用农业新技术，搞深耕细作密植，防止病虫害，合理施肥，夏收时全组每亩平均产粮143公斤，远远超过往年。群众看到了互助合作的好处，纷纷要求参加，入组农户很快增加到38户。互助组帮助解决组员中缺耕畜农具、种子、劳力等困难，显示出集体化道路的优越性。

莫如信出身贫苦，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长工出身的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投身于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运动。他带头捐献，动员农户调剂余缺，恢复农业生产。1952年他主动联合本村10户50余人，创办起“莫如信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他率先使用新式农具，选用良种、增施肥料并开展副业生产，当年小麦亩产平均比当地自耕农增25公斤，其中的33亩“碧玉麦”良种田平均单产达348.5公斤，创全省最高纪录。

各级党组织因势利导，结合群众自发的生产互助的经验，积极组织广大党政干部深入农村，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进一步组织各县农民开展生产互助运动，使各种临时性、季节性的互助组很快地发展为有少量公共财产的常年互助组。到1953年秋，平罗县成立互助组554个，参加农户4195户，占全县农户的42%；惠农县成立互助组611个，参加农户5139户，占全县农户的38.3%。此后，农业生产互助组在石嘴山各地普遍开展起来。

按照自愿互利原则组织起来的各类互助组，初步实现了若干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集体劳动组织，但仍带有个体农业的分散性，经济力量还很单薄，不利于兴办较大的农田基本建设和公益活动。因此，一些觉悟起来的先进农民和劳动模范，要求以较高劳动组织形式来适应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于是，在互助组广泛发展的基础上，1953年2月，戴玉玺互助组和莫如信互助组先后转为以上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属宁夏首批。戴玉玺和莫如信两个初级社成立之初，入社农户总共只有22户。当时莫如信社10户社员中有5户春牛口粮断顿，没有种子，社内133亩耕地只有8头毛驴，1头牛，半辆牛车。戴玉玺社12户社员同样存在缺粮吃，生产资料不足，土地分散等困难。这时，县政府提供贷款，解决耕畜、农具、种子等，并派出农技干部指导生产，两社的粮食当年便获得丰收。戴玉玺、莫如信还发动社员集资入股，积极发展副业生产，开设粉坊、磨房、养猪场、缝绗社等，并在全县带头试种棉花，使两社社员生活水平很快提高，农业生产搞得红红火火。群众看到了希望，纷纷要求入社，两社规模很快都发展到了30户以上，有力地推动了石嘴山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进程。

（据《石嘴山往事》）

抗战时期宁夏7名英烈惨遭活埋

抗日战争中叶，随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的到来，宁夏的国民党军阀马鸿逵也紧随其后，加紧了对宁夏抗日进步力量的迫害，特别是严密监控和残酷镇压中共宁夏地下组织和革命青年的革命活动，大搞白色恐怖。1941年和1943年的4月17日深夜，在银川老城隍庙（今兴庆区景岳小学附近）后面的旷野里，发生了两起秘密活埋事件：国民党宁夏省党部调查统计室和宁夏军警联合督察处的特务和刽子手们，在时隔两年的同月同日之夜，以极其残忍的手段，坑杀了包括中共宁夏工委书记崔景岳在内的7位中共地下党员和革命青年。这就是马鸿逵在宁夏制造的两起骇人听闻的活埋惨案。

1939年底，以杨一木、李仰南为书记的中共宁夏工委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不久由于部分党员和领导人身份暴露，敌人开始大肆搜捕共产党员。为保存力量，工委决定杨一木和大部分党员撤回边区，只留下杜琳、白玉光、马云泽等部分党员坚持斗争。李仰南为保证革命活动不致中断，改名为杨维宝隐蔽下来，一面和各地党员保持联络，一面请示边区党委另派人来接替他的工作。1939年11月，李仰南再次回延安汇报工作，边区党委决定派崔景岳、王博来宁，同白玉光一起组建新的宁夏工委。

1940年2月，以崔景岳为书记的新工委正式成立，共有6个支部，26名党员。工委研究决定，如果日寇进攻宁夏，便组织武装打游击；马鸿逵已公开反共，要把公开的抗日宣传工作严格区分并紧密结合起来；积极发展秘密党员，壮大组织力量。还决定尽快把引起敌特注意的江生玉、王世同等党员撤回边区。根据工委决定，崔景岳给边区党委写了报告，派江生玉去送，并嘱咐江在半个月内生动身，否则将报告销毁，以防意外。但江生玉延误多日未能离宁，也未销毁报告。

马鸿逵特务机关掌握了中共地下党员杜琳是抗大学生的情况后，便派特务李郁华化名林子玉，派往杜琳所在的新城小学当教师，伪装进步青年，接近杜琳，暗中监视他们的行动。杜琳毫无防备。4月13日，杜琳约崔景岳到他家商量事情。当夜12时许，军警将崔、杜二人逮捕。审讯时，杜琳坚不招供，承认自己是抗大学生、中共党员。接着敌人逮捕了马云泽、孟长有、江生玉等11人。江生玉在法庭上自首叛变，供出了崔景岳写给边区党委的报告，案情随之扩大。在敌人的大搜捕中，共34人被捕，其中有16名中共党员，宁夏党组织遭到惨重破坏。

被捕的共产党员在崔景岳组织下，成立了狱中党支部，他们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同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其中有马文良，辽宁省海城市人，时任三边巡回巡视团党组书记兼团长，1941年2月在盐池县回六庄开展工作时被捕；孟长有，系宁夏中卫县人，1937年入延安抗大学习，1940年初受组织派遣来宁夏，在同心县海如学校以教师职业为掩护进行地下工作时被捕。马鸿逵授意特务头子马效贤、高中第以“高官厚禄”诱惑崔景岳“悔过自新”，被断然拒绝。敌人无计可施，于1941年4月17日晚将崔景岳、马文良、孟长有3位坚强的共产党员押至银川城隍庙后（今银川市兴庆区景岳小学所在地），刽子们惨无人道地用铁锹、洋镐将3人的骨头、肩胛打折后推入大坑活埋。其余共产党员和个别进步分子一直被关押到宁夏解放。

宁夏工委遭破坏后，我党为了继续开展宁夏工作，于1942年春从湖南、重庆、兰州等地区派遣数名地下工作者和革命青年来宁，分散在宁夏中学、邮电局、《民国日报》社和马鸿逵部队中。正当这些同志以学习世界语为掩护，想办法接洽之际，被敌特毛破。时任宁中庶务主任的共产党员何自诚，在邮电局工作的毛破（共产党员）、陈硕甫、凌蕃、曹松林、姚益庭，在报社工作的李国青和炮兵连的刘斐等人全部被捕。敌人用尽酷刑无人招供，马鸿逵即以“奸党”“危害民国”等罪名，呈报国民党中央批准，于1943年4月17日晚将何自诚、毛达、陈硕甫、刘斐4同志活埋于银川城隍庙后。其他同案则长期监禁至宁夏解放；凌蕃、李国青病死狱中。

（据银川党史网）

抗战时期宁夏省的识字运动

民国时期的识字运动始于1929年。为推行识字运动，尽快扫盲，国民政府颁布了《识字运动宣传计划大纲》，轰轰烈烈的识字运动开始在全国展开。其时，宁夏建省不及数月，便遭马仲英部侵袭，百姓生灵涂炭，识字运动无从谈起。1933年，马鸿逵执政伊始，宁夏又遭孙殿英侵扰，“孙马大战”以西北诸马胜利而告终，宁夏省各项建设始入正轨，识字运动作为新生活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开始在宁夏施行。

全面抗战前的识字运动

1935年，宁夏省颁布《实施识字教育方案》和《社会教育实施大纲》，大纲规定：“凡在本省居住之人民，年在四十五岁以下十岁以上，均有受社会教育之义务，无论农工商贾，每家有三人以上者，须出一人到所管区域内所设之识字班受教，每日上课一小时，每日认字六个。”马鸿逵委任省府秘书长叶森、省禁烟处长冯延铎，共同组织“宁夏省实施社会教育识字运动办事处”。

识字办事处成立后，先后在省垣（今银川市）设立识字班12处，共收学生2500人，由省府秘书处及禁烟处职员担任教导训练之责，省会公安局负责管理之职。省政府根据宁夏省实际情况及需要，编印出《平民识字课本》作为学生读书材料。当年9月1日，省垣所设五个识字班开始授课（以后又陆续成立了第六至第十一识字班），28日，宁夏省垣实施社会教育识字运动大会隆重举行，各识字班师生及各界人士1000多人参加，宁夏省识字运动正式拉开帷幕。各识字班地点均设在省会公安局及各分局内（均为庙宇改建），为统一时间，公安局于每日上课前15分钟，在南城墙中间，点放识字炮，通知学生上课，除放炮外，还在城内玉皇阁、鼓楼、西塔、南门楼、北门楼敲钟，以广听闻。

省垣第一期五个识字班自开班至次年11月底受训期满，分别进行考试后，成绩及格者毕业，不合格者退入第二、三期识字班继续识字。通过近一年课程，学生初步具有了识字、书写及使用之能力。据《十年来宁夏省政纪要》统计，至1936年5月，宁夏省垣及各县城共成立识字班28处，学生人数5562人。除识字班外，为推行识字运动，省垣还在各街口市巷设立识字牌及问字处（43间），方便市民随时获得识字之便。

由于识字运动试办取得一定实效，马鸿逵决定继续推广实行，并印发了告民众书。全面推广未及实施，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宁夏省方兴未艾的识字运动亦受到影响，各识字班被迫停办。

全面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地处战略后方的宁夏省局势相对稳定，推行识字运动重又提出。

1938年5月，省政府将识字班划归宁夏省义务教育委员会主办，经费由中央补助义务教育项下支出。文教委所办识字班具体情况，因缺少相关档案史料，现依据《宁夏省教育概况》（宁夏省教育厅编，1940年7月）的统计：1938年5月至1939年1月，全省有识字班32个，教职员73人，学生6085人，经费2550元。1939年1月，宁夏省社会教育工作又改由宁夏省党部办理，意在寓党化教育于社会教育之中。经3个月积极筹备，人事、经费等就绪，宁夏省社会服务处正式成立，服务处主任由省党部主任委员兼任。省社会服务处重新厘定普及党化教育实施方案，将全省划分为四区，每区成立社会处，设主任1名，共设置室内识字班31所，露天识字班163处，学生计15000余人。按

抗战时期的识字运动

照规定（强制性），凡粗识文字，年龄13至45岁者，每日须上2小时“室内”识字教育，一年毕业；其他自13岁至50岁之男女，不识字文，而住在十里以内者，每5日上一次露天识字班，每次两小时，半年毕业。

由社会服务处办理的识字运动，比全面抗战前的规模大了许多，但内容上则改变了许多，教室识字班课程有：党歌、国民公约和誓词、总理遗嘱、三民主义浅说、平民识字课本为主课，加授抗战歌曲、珠算；露天识字班课程：除党歌、国民公约和誓词、总理遗嘱、三民主义问答等课外，并加授政府文告、政治常识、抗战消息等。1939年，宁夏省城等地先后遭到日机轰炸，学校外迁，人口疏散，所谓识字运动实际上成了纸上谈兵。

1940年3月，宁夏省政府按照“一切政治之措施，应即迎合战时需要为原则”要求，对宁夏以往办理社会教育各办法，重新修订。为扫除

《平民识字课本》

《平民识字课本》共100课，生字2000个，内容涉宁夏地理、人生哲理及各机关主管事项。现择其课文数篇，以窥读者：

国民 我是国民，你是国民，他是国民，咱们都是国民。

宁夏 宁夏省，好河山，东有黄河，西有贺兰。

识字 来来来！来识字！不识字，是瞎子；不识字，苦一世。

爱国 国强家自富，亡国即丧国，爱家爱国，复兴我中华。

放足 妇女缠足，有损无益，明知故犯，此害极！责在家长，痛自警惕，早日解放，勿盼伊戚！

国货 外国货，充市场，利外溢，国本伤。本国货，应改良，质耐久，价勿昂。我宁夏，太荒唐，用外货，甘自戕。国愈弱，敌愈强，倘不悟，国必亡。

破除迷信 巫婆妖道，阴阳风水，瞎子算命，请神捉鬼，自迷自信，受骗受累，应亟破除，免貽后悔！

社会教育 社会教育，是救济失学的明灯。年大年少，随时都可增进智能。人人读书识字，扫除社会文盲，共同努力推进，社会日益文明。

从以上课文可以看出，课本内容极易懂，适于初识文字的人群诵读，亦是研究民国宁夏省文化教育的珍贵史料。（据抗日战争纪念馆网）